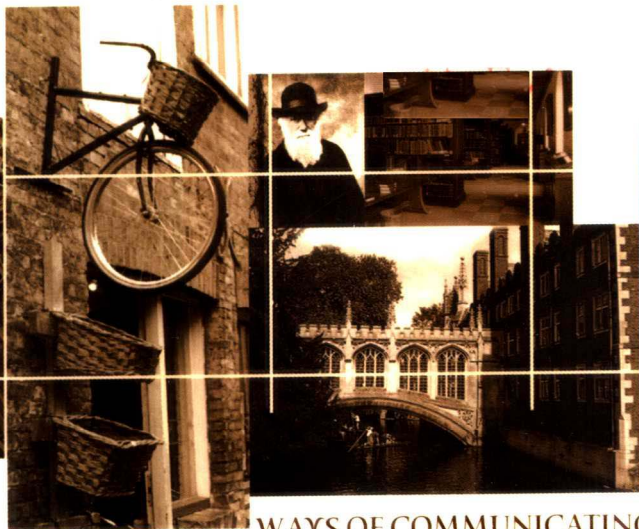


剑桥年度主题讲座



John Alvey
Horace Barlow
Patrick Bateson
Noam Chomsky
Alexander Goehr
P N Johnson-Laird
David Lodge
D H Mellor
Jonathan Mi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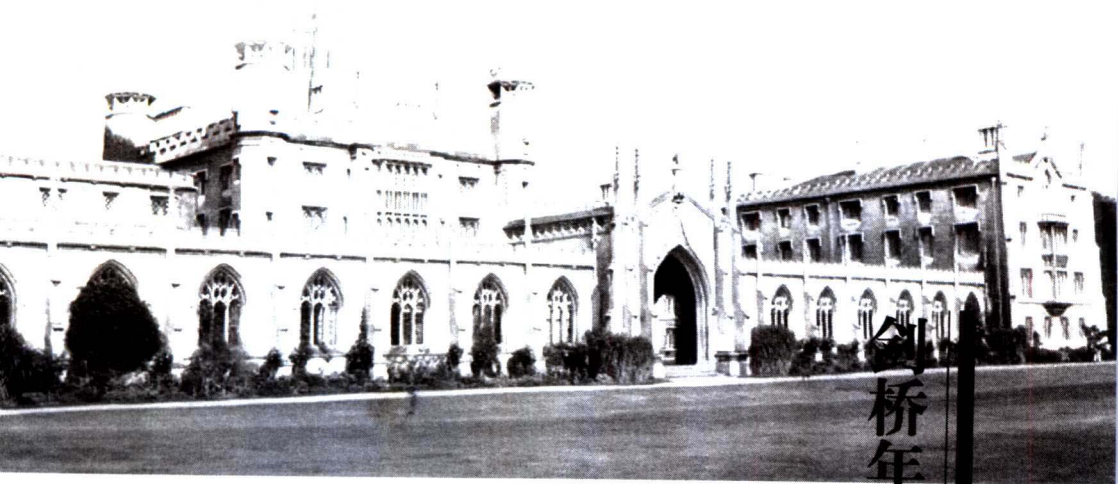
D H Mellor D.H.梅勒 编
彭程等 译



WAYS OF COMMUNICATING

交流方式

华夏出版社



剑桥年度主题讲座

D H Mellor D.H. 梅勒 编
彭程 等 译

交流方式
Ways of Communicating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流方式/(英)梅勒编;彭程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
(剑桥年度主题讲座)

ISBN 7-5080-3864-9

I. 交… II. ①梅… ②彭… III. 人际交往-方法-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884 号

Ways of communicating: the Darwin College lectures/edited by D. H. Mellor.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First published 1990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4225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10.5

字 数:140 千字

定 价: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导论：什么是交流..... 1

P.N. 约翰逊-莱德

I

脑内的交流与表达.....15

贺拉斯·贝娄

2

动物交流.....37

帕崔克·巴特森

3

语言与意识.....59

诺姆·乔姆斯基

4

说真理.....85

D.H. 梅勒

5

小说作为交流方式.....101

戴维·罗奇

6

无言的交流.....119

乔纳森·米勒

7

作为交流方式的音乐.....131

亚历山大·戈尔

8

通信和交流.....149

约翰·阿尔维



导论 什么是交流？

Introduction: What is
communication?

P.N. 约翰逊-莱德 (P. N. Johnson-Laird) 普林斯顿

大学心理系教授

在《人类和动物的情感交流》(*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the Animals*)中,查尔斯·达尔文写道:在人类演进进程中,同一群落成员之间借助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有着头等重要的地位;同时,表情和肢体的表意性行动大大增强了语言的力量(页354)。达尔文是对的,但就像绝大多数19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他对交流观念的接受过于自然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说,拥有交流能力会给物种带来好处,得出这点结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你看到一个老虎露出利齿。

你警告我。

我绕开了它,侥幸活了下来。

故事完。

但是,交流远非这么简单。事实上,它非常复杂;正是对交流活动中所隐藏的复杂性的揭示,才引发了20世纪的一些伟大发现。

这种复杂性的确切标志是我们的无知。譬如说,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人类的听觉系统怎样辨别言语,所以我们也无法创造出把言语转化为文字的机器(现有的机器,跟人进行这种转换的性能相比,差距太远)。我们没有关于任何一门自然语言的完整语法;我们仍然没有对句子如何传达意义的完整解释。我们交流情感,就像达尔文说的,但情感究竟是何物我们仍然弄不清楚。在日常交流中,所有这些元素都在完美地运转;但这时我们的理论家们却正绝望地陷于迷失之中。达尔文时代的科学家不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而在当代的研究者也开始对交流进行研究以后,他们加剧了这种次阶无知状况。另外,要动用多学科力量进行研究,这点也证明了这一领域的复杂性。

眼前这本书既是从艺术也是从科学角度对交流进行研究。发言人按照出现的顺序分别是:一个生理学家、一个人类学家、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小说家、一个剧作家(同时也是新派心理学家)、一个作曲家和一个工程师。交流是他们的兴趣或者是他们的研究领域,或



者两者都是，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从各自的视角提出了内在一致的完整观点。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要求去分析交流概念本身。这样一来，我在引言里就要给出这样的分析，也好让读者弄清楚，上面那些不同的部分如何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概而言之，我就是要试着回答达尔文没有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交流？

知识很少会因为先验的定义而有任何的增加，所以我不想事先就给出定义，而是要对一些历史中发生的事例进行分析。开始的例子设置好场景，并且在交流和其他因果关系类型之间建立某种关联。而后面的例子则对不同的交流样式进行比较。

月亮对潮汐的发生有着因果性的影响，但除非在隐喻的意义上，否则我们不说它们在相互交流。交流也会造成因果影响，但又不仅仅是因果关系。特别之处就在于，交流方有某个信号（message）要传达，而月亮没有。信号这个提法也有问题，不过我们会在后面的例子中把我们对问题的这一直觉式理解说得更明白点。

当火蚁从大量食物那里爬回蚁穴，它的其他同伴可以根据它一路留下的某种化学物质——所谓“外激素”——寻迹而至。要是食物没有了，回来的蚂蚁路上就什么都不会留下。还有一些其他外激素传递性吸引、示警等信息，在哺乳活动中也有它自身的作用。

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譬如像 Edward O. Wilson，习惯性地 把外激素看成是“化学信号”，并认为火蚁有拿出来进行交流的一个信号，譬如说：“食物！”但是，火蚁之所以留下痕迹，可能仅只是品尝食物之后的一个生理结果，而其他工蚁的行为也同样可能只是它们发现外激素之后直接的生理结果。我们在实际中看到的 就是，它们对气味的反应就是跟从它；而它一旦发现这种气味，所能激起的惟一反应就是循迹而去。当然，在闻到外激素的气味时，并不需要由蚂蚁的神经系统刺激起昆虫的意识，使其建构起对“食物”这样的初级观念的内部再现。事实上，利用痕迹行事跟内部再现是相悖的：如果能顺着护栏游玩，你就不需要地图。观察蚂蚁的生物学家可以说“通过化学元素交流”，但蚂蚁本身可能根本就没有形成对食物的什么内在再现，它们寻迹而至的行为可能完全是受到再现之外的因素控制。人们把某些过程称为“交流”，只是词典编撰家的方便行事。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缺乏核心要素：没有信号，

只有因果关联。

当满载而归的蜜蜂飞回蜂房之后，它会吐出采集到的食物，然后在垂直的蜂房边沿舞蹈。正像 Karl von Frisch 指出的，这舞蹈的节奏跟食物源的远近相关；食物越近，节奏越快。舞蹈的主要线路和垂线之间的夹角与太阳方位和食物方位之间的夹角相一致，这点巴特森在第二章中将有解释。那些看到舞蹈的工蜂（当然也会注意到外激素线索）就会几乎准确无误地飞向食物源。

蜜蜂的舞蹈传达出的信息几乎跟蚂蚁的外激素痕迹一样多。不过这两种情况之间有着细微的区分。假设信号是对事态的一种内在显现，那么舞蹈的蜜蜂确实是在传递信号。证据来自于 von Frisch 精巧的实验。他把蜂巢放在山脊一侧，把蜜蜂放在另外一侧，这样蜜蜂只能曲线前进。这样，当它们回到蜂巢时，就不再跳舞，以指示它们飞过——无论是刚开始起飞的方向还是飞行中间的变化——的方位。相反，它们就舞出一条“蜂线”，越过山脊直接从蜂巢飞往食物，而不是绕山而行。它们能构造出这样的方位，这证明了它们的神经系统可以建构起对世界的再现。这种再现仅包括两个维度，因为在蜜蜂的舞蹈中没有对“上”或“下”的指号，它们也无法交流食物在垂直方向的位置。但不管怎样，蜜蜂传递信号；这种信号决定着舞蹈编排，因此它们是在成功地交流。

蜜蜂的舞蹈是指号性的 (symbolic)，其主要目的在于指示出食物的距离和方位。就像任何其他指号性行为一样，在下述意义上它是任意的：舞蹈中可能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指号规则，但对蜜蜂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毫无影响。这样，食物的距离就可以从舞蹈中蜜蜂发生的位移表现出来。在能指（或者说指号行为中某一要素）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点在自然语言这一例子中也很显然。事实上，正是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奠基人费迪南德·德·索绪尔首先强调指出了指号关系中的任意性。

怀疑者可能会争辩说，火蚁留下的痕迹同等程度地取决于对外激素的任意选择：自然选择本可以竭力表现出另一套方式。但是，如果对外激素的灵敏反应是通过直接的生理方式控制着蚂蚁的行为，那么这种选择就不是任意的。改变外激素，蚂蚁的很多生理情况也会改变。这在其



他例子中表现得更加清楚。

葡萄糖在被吸收之后，它要么立即被作为能量的来源（以三磷酸腺苷/ATP 的形式转化），要么被贮存起来留待以后使用（以肝糖形式贮存）。它们不同的命运取决于在吸收的时刻你是否需要能量。人们可以想像，有种机器人，它运用内部的指号系统对能量情况予以指示；同时，这种特定的指号选择又具有我们提到的索绪尔式的任意性。但是，尽管身体内的反馈系统控制着被吸收的葡萄糖的命运，它并没有丝毫的指号性。控制着葡萄糖进行分解或被贮存的酶，它们本身的出现和消失完全取决于身体内部 ATP 的数量。没有什么能指示可供使用的能量的多少；恰恰是能量的多少控制着整个体系。如果 ATP 转换成了其他物质，那么肌肉的整个生理状况也会随之改变。同样，外激素也是生理反馈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生化特性产生的后果不止是“准-指号”这个角色所能涵盖。

迄今为止我们所描摹的交流画面，它们都要求先由交流发起方建构起对外部世界的内部再现，然后通过某些指号性行为将指示内容传达出来。接受方必须首先看到指号性行为，亦即建构起内部再现，从此出发，复原出它所指称的更深一步的内部再现。而最后一步还要取决于，在对指号性行为进行阐释时，占据主导位置的任意性法则是什么。

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交流可能是单方面的事情。当你闻到新烤出来的面包的香味，你闻出来了，然后就像火蚁一样顺着味道循迹找到面包店。面包店并没有跟你交流，因为这味道是副产品，而不是信号。但是，你有了对面包的内在再现，就像你从面包房得到了信号一样。反之，当你在用让人安静的词语和常见的抚慰动作哄哭闹的婴儿时，你在传递信号——任何其他大人都很容易能理解这一信号——但这些话和动作对婴儿的影响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因为指号内容。

对动物交流的研究有时和极具欺骗性的例子搅和在一起，让人深感迷惑；看起来完全是交流，结果却被证明是单方面行为。动物有时像是在对指号信息作出反应，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受到训练者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暗示影响，只不过这些暗示跟信号内容有一定关联。同样，

看似动物之间的交流，它可能不依赖任何中介，而仅只靠其中一方对另一方对环境作出的反应的观察。譬如，两个形状不同的东西，各自放到两只海豚面前，一只海豚像是在告诉另一只海豚看到的情况——不过，虽然结果是两只海豚都得到了食物作为奖励，但第二只海豚只是对第一只海豚的反应作出适当反应（而不是双方交流的结果）。当然，我们还要慎重的是，不能因为上述情况就以为处处皆陷阱。正如 Robert Boakes 所说，鸽子之间就可以进行交流。实验中有两只鸽子和两个锁栓。在刚开始的时候，交流的“接收方”想要啄其中一个锁栓，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它啄对了，两只鸽子就肯定能得到食物。“发起方”这时会明白，某种特定刺激会带来食物，并且在“接收方”正确行事时，它却要改变形迹。这样，“接收方”也就学会了，只有在“发起方”按照预期方式行事时，它才按照惯常的倾向行事。在这当中，重要的一点是，鸽子的行为酷似交流，但却没有交流任何信号。它们的信号是非指号性的：交流活动的两个单方面行为严丝合缝地形成了整个过程。

把交流看成意识中再现的指号性传送来分析，这点可以很完美地运用到对简单的陈述性内容的分析中——从蜜蜂的定位到警告有利齿的老虎。但是当运用到更多更丰富的交流形式——无论是传递关于发起方情感状态的信息，还是那些借助自然语言丰富资源的交流——时，这一框架要经过修正。

像老鼠（或者人类）这样群居的哺乳动物的生活是由情感控制的。正像 Keith Oatley 和我曾经证明的那样，情感担当着一种双向的交流功能。首先，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观察会激起内在的情感指号。这种指号使得人们为符合这一情境的整个行动过程做好准备。它所激起的情感反应比起昆虫来更为灵活；跟复杂的指号信息的解码和评估相比，情感的作用过程更为快捷。激起这些情感指号的，往往是依附感的形成、对竞争者的厌恶以及同仇敌忾、共同对敌诸如此类。其次，情感会流溢出来，形成个体的表意性行为，从而通过外在的指号，以这种方式与它者形成情感的交流。这一点达尔文曾有所强调。与他者相互作用的重要情境实际上可以分成一些小的基本情感组合，这在群居性哺乳动物中非常普遍（幸福 - 悲苦，愤怒 - 恐惧，渴望 - 满足）。



情感是在看到一些事件之后受到激发而形成，但就情感进行交流时，传达的往往不是这些事件引起的内在再现的内容，而是个体对这一内容的反应。譬如，看到劫掠者，会让个体心下恐惧，并准备好战斗或逃逸。它的示警呼号会让它与群体内其他成员就恐惧情绪形成交流。这种呼号不再有其他任何作用，而只是用来传递这一情感的指号行为，这点已近仪式。这一信号的主要内容是一个能迅速传播的情感状态，因此接收方反过来也受到这情感的感染——那些要相互协作的，会产生同样的情感；那些正相互敌对的，会产生相反的情感。外在的指号会促成内在指号的形成。

人类的交流方式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为复杂，而且借助自然语言，交流也更为充分。不管它当初什么起源，不管它用于什么其他目的——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思想的外化——比起任何其他指号系统，自然语言都更为丰富。根据当代心理语言学 George Miller 的解释，所有由人结成的群体都操着一种语言，所有人类语言都有一套自己的语法和语汇。所有这些语汇总是关于空间、时间和数字问题，或者反映正确错误，或者传达逻辑关系的词语。语法则包含语音和句法原理。语音包括元音和辅音，它们本身有特定的发音，同时构成人类可能发出的有限的声音。句法则包括语气、语调以及词组与句子的不同层级结构。

语言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主要的因素。首先，词汇为说话者提供了由单个指号（词语）组成的庞大储备库。其次，语法将指号组织起来，形成无数各自独立的指号信息（句子）。第三，这些信息不受此时彼地环境的当下控制。它们可以被有意识地用以描述其他事态，甚至是那些很遥远的或虚拟想像的事态。人类能讲故事（在故事的两种意味上）。他们能彼此提出建议和要求。他们能以言行事。

有些黑猩猩学会了美国聋哑人用的手语，另一些则学会了做一些指号性动作，它们都能够以最初级的方式“说出”它们的需要和当下所处的环境。但是，黑猩猩的这些成就是否确有意义，对此人们颇有争议。它们是否掌握了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力量，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能让人满意的回答。

在人类交流中，在语言和其他交流方式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当我们相互交谈时，我们不仅就内容而且在态度、情感、人格等方面进

行着充分的交流。有一次，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宣读托洛茨基的电文：“您是对的，而我错了。您是列宁真正的继承人。在此我要向您致歉。托洛茨基。”据 Leo Rosten 说，当时一个犹太裁缝从人群中挤上前去，向斯大林解释说，电文他应该这样读：

您是对的，而我错了？您是列宁真正的继承人？在此我要
向您致歉????!!

尽管我们立即就能听出这种语调的讽刺意味，但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发音器官如何取得这样或者那样的效果。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者当然能告诉我们一点我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对语言的自然运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无意识过程——而且这不是那种病人很合作地睡在躺椅上，心理分析师希望去挖掘的过程，而是使得我们有意识的经验成为可能的过程。它们从未进入意识之中，因为是这种过程创造了内容：你不可能看到你自己的内省过程，你不可能本末倒置。

无意识过程使得我们能言说和理解一种语言，它在各层次上——从单个语音的确定，到我们迅速的自然推论，以使得语句的外在内容显得有血有肉——都发挥着作用。这种推论至关重要，因为语言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境，尤其是说者和听者共享的背景预设。往往只有你与这些预设有着切身关联，交流才有意义。在撒切尔夫人赢得首次大选的那天晚上（1979 年），托利党前党魁爱德华兹·希思先生正接受电视采访。这次采访的关键部分是这样的：

采访者（Robin Day 爵士）：我想您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你的回答是？

希思：等等看。

采访者：您会不会？

希思：或许。

如果你不知道采访与被采访者脑子里（以及这整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这种交流就像是对英文拙劣的自嘲。采访者的问题“您会不会”特别有问题，因为这一缩略完全设定了人人都知道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您会在撒切尔夫人内阁任职吗？”



在交谈中任何一个新的句子都会改变语境，从而影响对随后交流的阐释。语境是几乎所有人类交流都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不可能造出一个句子来，人们不依赖语境和背景预设就能对它作出解释。想要造出“永动句”，譬如：

1492 年 10 月 12 日下午两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

并让马丁把这写在明信片上寄回家，这种尝试很快会失败，因为理解这句话需要有对日历和时间度量的预设。事实上，阐释是如此依赖语境，以致有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声称，根本没有什么科学理论能界定语境的作用。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第 3 章）：“一句说出来的话究竟有什么含义，或者说，说话者可能意指什么，要想对此作出决定，要动用几乎所有的信息和策略。”

更悲观的想法可能要从某些文学批评家追溯到德里达，并且最后总要归结到大陆哲学的祖师爷马丁·海德格尔：想在交流中获得正确的阐释，这种要求实在是无稽之谈。人类的交流不是信息的传递：没有独立于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通过语言所创造的世界等等，直到这种解构学说最后将自身解构。按照这样的路数，你都会怀疑：你怎么能警告我？你怎么能告诉我说有露出利齿的老虎？

事实上，人们能够成功地交流而且正在成功地交流着。一个说话者看到某一事态，也就是说在意识中形成对该事态的再现。说话者想要就该事态的某些方面与听者进行交流，因此，他依照常识，用了某些适当的词语加以描述。听者听懂了这些词语，同样依据常识能够迅速抓住说话者当下的意图。从而，在听者意识中，就形成了对原始事态的再现模型。当然，信息也会沿相反的方向传递，从而使两个参与者得以形成共同的认知，即他们完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流活动。交流时有错误发生，而且人们知道这种误会可能发生，或许充满了悖论意味的是，这个事实也正是对交流能够进行正确阐释的最显然的证据。如果谈话没有所谓正确阐释，那么要么就不会有错误发生，要么有这种错误它也不会被确认。当然，要想厘清说话者的意图，即他为什么会选择交流这个或那个信息，这个进程不会有终点。而且文本不会回过

头去说话，一旦作者的基础性假设变得模糊不清，它的阐释者也就能自由地在文本中注入更宽广甚至更标新立异的解释。但是对交流的探讨就像对人类心理学的事实进行探究一样。而解构主义者却将众所周知的溯源说话者意图的困难跟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相混淆：交流能正确地被理解吗？

前面我已经提到，能就想像中的事态进行交流，这是人类的特权。尽管虚构究竟何指以及像“哈姆雷特的母亲”这样的摹状词究竟何指，这些都是哲学上的问题，但对这些交流的理解似乎与对就真实事态进行交流的理解毫无二致。两种情况都要求对交流所描述的事态在头脑中进行模型建构。惟一的区别即在于一种情况下模型宣称和外部世界相对应，另一种情况下则不然。在一种情况下，你问“这是真是假”是有意义的，而且像 D. H. 梅勒在第 4 章所说，这一答案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应对世界的能力。

在人类进化的某些时刻，交流似乎到了尽头。William Empson 爵士对中文的古体诗这样评价道：

缺乏节奏，不循韵律，也没有对仗之类的常用技法，这些短章之所以被称为诗是因为它的简洁：两个句子放在一起，好像它们自然就有关联，而读者也被引导着自己去深思究竟是什么把它们连接到一起。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入诗，其中的原因有待读者去读解：他会给出很多理由，并且在自己心里给它们排序。我想，这就是语言使用中最具根本性的事实。

更极端的观点来自保罗·瓦莱里的格言：“诗由词而非思而成（Poetry is made from words, not ideas）。”这或许有点夸大其辞，但却是另一观点的解毒剂，即认为对词语本身可以毫不关注，却能写出真正的诗作。诗歌可能除了它自身之外并没有别的信息要去传达，音乐也同样没有超越自身的意义——欧洲音乐传统尤其如此。但在它们传递的“信息”中似乎有着一样共同的成分：它们都会激起将自身融于其中的人们的情感反应。因此，使对交流的分析愈加扑朔迷离的最后的因素就是，对人类来说，指号本身而不是对指号的阐释，可能是信号中最重要的组成成分。



在这篇引言中，我信手罗列了对几种不同交流方式的分析，从最简单的陈述到其重要性仍然晦暗不明的信号传递。我的目的在于，为我引入的以下各章的讨论打下一个基础。前面我已说过，真正交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建构内在再现的能力。这个过程本身既依赖于物理上的因果关联，也依赖于内部的交流。譬如，影像形成源于这样的光学过程，有光射在对光形成反射的表面上，再经过生化反应转换成对神经的刺激。对神经的刺激是大脑中交流链条的起点。在第1章，贺拉斯·贝娄考察了这一链条，同时考察了从视网膜细胞发散开来的对神经形成刺激的过程和结果。

只要生命体能够建构起内部再现图像，它们就能够相互交流，这一交流系统常常有助于生命体的生活。帕崔克·巴特森在第2章对动物交流的论述中对这一助益的本性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正是系统得以演进的根动因。许多生物学家相信，动物发出信号，其目的在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控制他者，但根据巴特森的说法，许多信号只是信号发出者内部状况自然的精确显现。如果说在争斗的形式中，欺骗是有好处的，那么在求偶的仪式中，欺骗就很难说有什么好处。从动物交流可以得出的一个有道理的推论是，自然语言的进化有助于人类交流的出现。但这种推论仍然受到质疑。巴特森指出，在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某些认知上的萌芽表明，在它们中间可能确实存在语言，但仍然没人能够确证在人类之外遣词造句能力的真正存在。

乔姆斯基，这位给现代语言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语言学家，在第3章中指出，语言是“漂亮的”但不是“有用的”。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语言进化是为了方便使用或掠取外物。它的功能可能仅仅是为了思想的外化而不是为了交流：语言或许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在奔跑的同时张大嘴巴而形成的呼吸系统演进的副产品。但是人们得以交流，还有一个前提，即他们的内在语言——他们的词汇和语法——要足够接近。他们是怎样逐渐获得这种内在的知识的，这是乔姆斯基在本章讨论的问题。

交流的一个目的在于能够让我们通过指代者体验世界，而D. H. 梅勒第4章要讨论的正是交流的这一功能。他认为，对和错既是信念（可以意识到和被了解的内在再现），也是那些指导性行为——比如用以传达信念的陈述——的特性。当然，有意识的交流有赖于对这样一种信念

的自觉。作为观察的结果，你获得了一个信以为真的信念，并且作出某一行为，把这一信念传递给我。作为我对你的行为进行观察的结果，我有了同样的信念，因为我相信你相信这一信念。这样，对梅勒来说，描述的知识就是心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的间接形式：交流是间接的观察。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论其起点或终点往往都是有意识的信息，而在大脑中的居间过程却几乎是完全无意识的。不管它涉及到的是事实还是幻觉，其过程大部分是一样的，这点我前面已经有所强调。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以活灵活现的幻象形式建构着故事。但到早上我们又将大部分梦境忘掉。没有人知道这种“跟我们自己进行交流”的意义。但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这些梦境可以让我们娱乐，又因为大脑让身体暂时失灵，晚上梦境中的出生入死对我们又了无伤害。小说把对故事的建构提高到语言艺术的层次。正如戴维·罗奇在第5章中断言的那样，这也是交流，不过是屡受争议的一种。小说对行动和对话的包容力跟对真实世界的描述中的包容几乎没有区别——否则，我们怎么会被 Maurice Zapp 的滑稽动作逗乐，就像看到 Norman Mailer 的表演一样呢？但是，因为文本本身没有作答，作者的原初意图就不可能确定地复原（甚至作者本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小说创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它要是有所意指，它最深的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很深的困惑。就和梦境一样，这些也是永远讨论不完的主题。

人类交流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往往不是相互分离，各自传递信号，而是被编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织品。这一观点在乔纳森·米勒第6章对非语言的交流的解释中被反复强调。他还在无意识地暴露信息——我前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单向交流——与有意识地通过手势和动作进行交流之间作出了区分。人们很容易认为，用语言传递信念，这是最基本的事态，而做手势或动作这些行为传递的正是原始的情感伴随信息。但米勒对此提出了坚决的质疑。他认同 Erving Goffman 的观点，认为这种非语言交流必须联系我们的社会习俗范式才能加以解释。他说，在公共场合，我们的行为是要向他人传递一组信号，以告诉他们：我们有权站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一信号可能没有特定的陈述内容，但它也肯定不是动物交流中原始指号系统的残留物。它